

译匠天缘

中

金克木◎著

金克木（1912—2000），字止默，笔名辛竹，生于江西，祖籍安徽寿县。

当代著名学者，印度语言文学专家，翻译家。

金克木学贯东西，知兼古今，学术研究涉及诸多领域，自己在生前也自称是「杂家」。

他除了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外，在中外文化交流史、佛学、美学、比较文学、翻译等方面也颇有建树，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青年译本

黄克木题



读书小议

读 书

其 一

对于书籍的读法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：一是读“书”，一是读“人”。正像教书也可以分成教“书”和教“学”一样。读“书”是以我为主，我寻材料供我用，和查考辞书类书的目的——一样；所以读的书，也无所谓好坏，凡可以供我利用的都要读。这正是写卡片抄材料的记问之学，学得好时，便是淹博。读“人”却不然：读一人的著作，想见其为人，于是尊之为师，敬之如友，研其思想，学其品行，择善而从，不善则改，所注意的是见解，所学习的是做人，不嫌狭隘，但求贯通。这样读书，结果也许只精读一部全集，但确可以受用终身。读“书”能博足以炫人，所失在浅；读“人”而精足以立己，所弊在陋。此外的读书，若不是当课本学技术，就只能算是消遣而已。

其 二

“学以致用”是句老话，“不要读死书”是句新话；但

从学问的本身说来，无所谓有用无用；而从学的人这方面说来，只要真学就真有用，就是说，至少所学直接对己间接对人都有影响；所以，如果我们不把“用”的范围定得太偏狭，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就该事先注意这学习所应有的结果。这样便不能生吞活剥的读书，给人家当收音机；学的经过也就应当大致分做：学——思——行；打个比方说：吸收——消化——营养。

其 三

抽象地论读什么书，似乎无益，其实也很有帮助。读专书，专读书，都已近于老生常谈了，实际上奉行的人还是很少。读书人大半还是喜欢东抄西撮杂凑起来的书，只求便捷，不怕肤浅，又喜欢广博而不肯专精；这都是不能牢记着上两条原则的结果。还有一条原则也很重要，便是多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。我们往往翻开一本书后，一看句句都是自己心中要说的话，于是非常痛快，佩服，很高兴地看下去，以为这是正对自己胃口的好书。结果却往往是一无所获，即有进步也很少；因为书中意见，自己既在读书之前便有，那么读了之后，自然也不过是更坚信或更丰富而已。惟有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，可以使自己瞿然一惊，然后以敌人的态度去观察这本书的意见。结果若是自己被人折服，自然是自己原有的见解不对，从此便更进

一步；若自己攻破了书中的理论，也就是自己受到了一次论敌的冲锋，无形中也加强了自己的力量。因此“正合吾意”的书愈多读，愈无进步，愈容易流入偏狭；远不如多读几部不合吾意的书。但这样读书也有两个先决条件：第一是要能批判地读书，有自己存在，不为书所囿；第二是有所为而读书，不要视同看看小说之类的消遣。

1936 年

学 读 书

教我读书识字的开蒙老师是大嫂，实际上教我读没写成文字的书的还是我的两位母亲。

大妈识字，大概不多。她手捧一本木板印的线装书看一会儿，这是极其稀罕的事。她看的书也是弹词。多半时间是半躺在床上，常要我给她捶背。或者自己坐在桌前玩骨牌，“过五关，斩六将”，看“酒、色、财、气”，一玩一上午。身体精神特别好时，她会叫我坐在她腿上，用两手拉着我的两手，轻轻慢慢一句一句说出一首儿歌。是说出或者念出，不是唱出，那不能算唱，太单调了。

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喝，下不来。叫小妞，抱猫来。叽里骨噜滚下来。”

我跟着一句一句学。什么意思，她不讲，我也不问。

妈看到大妈这样喜欢我，很高兴。在我跟着她睡的自己房间里，她也轻轻慢慢半说半唱教我。

“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”

她不认识字，怎么会背这首古诗？是我父亲教她的？还是她听来自己学会的？我不知道，也没问过，只是跟着

她像说话一样说会了这四句诗，也不知道这叫做诗。

大嫂教我《三字经》时，她不看着书，和大妈、妈妈一样随口念出，用同说话一样的腔调，要我跟着学。我以为书本就是这样说话的。不同的只是要同时认识代表每一个音的字。这有什么难？大嫂用手按住教的两句，只露出指缝间一个字，问是什么。我答对了。不久，她又拿出一个纸盒，里面装了许多张方块纸片，一面是楷书大字，另一面是图。这是“看图识字”，都是实物，也有动作，正好补充《三字经》所缺少的。像“人之初”的“之”字画不出来，好像是没有，也许是有字没有画，记不得了。

每天上午大嫂在房里非常仔细地做自己的美容工作，我坐在桌边读书认字，看着她对镜子一丝不苟地修理头发，还刷上一点“刨花水”，使头发光得发亮。还用小粉扑在脸上，轻轻扑上点粉，再轻轻抹匀，使本来就白的脸更显得白。那时大哥还在北方，不在家里，她又不出门，打扮给谁看？是自然习惯吧？她已经满四十岁了吧？她是大哥的继室，自己只生过一个女儿，七岁上死了。是不是她把小弟弟当做自己的孩子教，排除寂寞？

我把《三字经》和那些方块字都念完了。觉得大妈、妈妈、大嫂的说话都不一样，还有书上的，口头的，“小老鼠”、“黄莺儿”、“人之初”也不一样，都很自然。她们说的话我都懂，不论音调、用词、造句有什么不同。书上文字写的就不全懂，我想，长大了就会懂的。她们不讲，我

也不问，只当做都是说话。

这时三哥中学毕业，天天留在家里了。那时中学是四年制。他上的是省立第一中学，是全省最高学府，全国的大学，除外国人办的不算，只有戊戌变法时办的一所“京师大学堂”，改名为北京大学。中学毕业好比从前中了举人，还有人送来木板印刷的“捷报”贴在门口。大哥是秀才，在山西、陕西、河南什么“武备学堂”当过“督监”。二哥和三哥本来在家塾请一位老师教念古书。大概父亲后来受到维新变法思潮影响（这从家里书中可以看出来。），送二哥进了什么“陆军测绘学堂”，三哥进了中学。二哥成为高度近视，戴着金丝眼镜回老家结婚没出来。三哥念完了中学，成绩优秀，是家中的新派人物。

有一天，大嫂在午饭桌上向全家宣布，从今以后，四弟归三弟教了。第二天我就被三哥带到他的房间里。室内情况和大嫂的大不相同。有一台小风琴和一对哑铃。桌上放的书也是洋装的。有些书是英文的。有一本《查理斯密小代数学》，我认识书面上的字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我正在惊奇和兴奋中，三哥教我坐在桌边，说以后我陪他念书，给我面前摊开了一本书。又说：“你念完了《三字经》，照说应当接下去念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千家诗》，也就是三、百、千、千。那些书你以后可以自己念。现在跟我念这一本。”这是第一代的中国“国文教科书”吧？比开头是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”的教科书还早一代，大概是戊戌变



法以后，维新志士张元济，也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和主持人之一，发起编订由“商务”出版的。

这书的开头第一课便是一篇小文章，当然是文言的，不过很容易，和说话差不多。三哥的教法也很特别，先让我自己看，有哪个字不认识就问他。文章是用圈点断句的。我差不多字字认识。随后三哥一句一句教我跟着念。他的读法和说话一样。念完了，问我懂得多少。我初看时凭认的字知道一点意思，跟着他用说话口气一念，又明白了一些，便说了大意。三哥又问了几个难字难句要我讲。讲不出或是讲得不对，他再讲解，纠正。末了是教我自己念，念熟了背给他听，这一课便结束了。他自己用功写大字，念英文、古文，我一概不懂，也不问。有时他弹风琴，偶尔还唱歌。我也看到过他两手拿着哑铃做体操。

这是我在家里正式上学了。这本教科书的内容现在记不得。书中浅显如同口语的方言更使我觉得熟悉了书本的说话。现在回想，书中有两课讲的故事和画的插图又出现了。是不是在第一册里，记不准。

一课是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”。文中对话平易而生动。三哥问我，双方对衔着怎么还有嘴说话，而且说人话？我答不上来。他便说，这是“寓言”。对话是做文章的人代拟的。以后读的书中这类话多得很，不可都当真。这是假做动物说人话，说的是人，重要的是意思，是讲给人听的。

另一课是“卞庄子刺虎”。“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”。这

时再去杀虎，两虎都不能抵抗了，还是第三者得利。意思和那一课一样，只是文中老虎没有说人话。忘了这是我提出来的，还是三哥讲的。

在争斗之中，双方都是相持不下，宁可让第三者得利彼此同归于尽，也不肯自己让步吃亏便宜对方。让渔翁和卞庄子得利的事不会断绝的。

小老鼠怕猫，黄莺儿唱歌挨打，鹬蚌、两虎相争，宁可让别人得利，这些便是我学读书的“开口奶”。这类故事虽有趣，那教训却是没有实际用处的，也许还是对思想有伤害而不利于处世的。到40年代初，我曾作两句诗，说不定是从这幼年所受无形影响结合后来见闻才会有的：

“世事原知鹿是马，人情惯见友成仇。”

外行读书

我本来没有专行，所以读什么专门书都是外行。不过外行读书另有妙处。内行重视的，外行不懂。内行忽视的，外行倒会看得津津有味。

就说实藤惠秀的这本《中国人留学日本史》吧，当然是一本专门著作，可以使人得到精神效益。可是在我这外行看来，首先想到，怎么中国人没有写出这本书？自从容闳的《西学东渐记》以来，好像我们这个史学大国连自己的近代留学史也没写过。接着想的是，书中的丰富史料看不过来，那就“红烧头尾”，看看第一章《留学日本的原因》和最后的《附记》吧。不料看后竟会觉得，这个头尾对于外行来说竟是特别有味道。我恨不得呼唤大家都来看看这第一章，看看中国和日本差不多同时“维新”，却有多么大的不同。随后我离开了正文，眼光被第8页的一条注吸引住了。这条注讲到了吉田松阴。依我看，他是日本近代留学外国的第一名，尽管他一生足迹没出日本国土。这正好像林纾是近代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的第一名，尽管他不懂外国文。世上事真是不能都以常理论的。

吉田松阴（1830—1859年）是日本幕府时代的一个武

士。在 1853 年美国军舰用大炮敲开日本大门时，他愤怒起来要求“攘夷”。随后他登上美国船。要求去美国考察留学，犯了禁令，被捕后囚禁在本州岛南端海边。他在监禁中办起了“松下村塾”，提倡“尊王攘夷”，学习外国为的是用来对付外国。当时的“锁国”禁令森严，只许中国和荷兰书流通。因此日本人大量翻印上海出版的汉译科技书，包括法学书《万国公法》；还学荷兰的科学，称为“兰学”。吉田松阴在狱中学校里培养出来许多志士。这些人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幕府。在 1859 年吉田松阴终于被处死刑，还不到三十岁。过了八年，1868，明治元年，幕府统治结束，日本宣布维新。松下村塾的学生参加政权。有不少著名的首相和大臣都是吉田松阴的门下。实现了“尊王”，便即致力于“攘夷”。明治元年，公布《御誓文》，创办报纸。二年，府县设立小学，改建大学。三年，设中学。五年，公布学制，实行义务教育。六年，公布征兵令。军国民教育成功，对外作战。从 1894 年打中国起，一直打到 1941 年打美国的珍珠港和英国的新加坡。直到 1945 年被打败了，才结束了由吉田松阴开始的近代日本史的这一段。日本人并没有鼓吹吉田松阴这个人，可是他在囚禁中创立的松下村塾还照原样保存。几年前有个美国人前往，照日本人规矩叫“参拜”，一切照一百多年前的礼节风俗。他在海边木屋檐下听着风声雨声海涛声，写了一篇游记介绍。中国人去日本的很多，不知有没有人去观光过。松下村塾是日本人

精神上的神社。日本当年以此精神用于军事，成为大国。战败后以此精神用于经济，又成为大国。诀窍是他在囚禁中办学校培养未来的风云人物。他的学生掌权便首先宣布义务教育，实即强迫教育。电视剧《阿信》描绘，那时连被雇用当小保姆的可信也得背起小娃娃去上学。否则严厉处罚她的雇主。吉田松阴的法宝是培养人。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家。换句话说，要有什么样的国家，先得有什么样的人。

有一本《丑陋的日本人》。作者高桥敷是天文学家。他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去南半球秘鲁教大学兼研究。书中自述上课不久就遭学生抵制，认为他的西班牙语讲得太坏，听不懂。他便对学生谈起，一百多年前日本人的文盲程度比秘鲁的印第安人还要严重。那时日本人几乎不懂外国语。外国老师又不讲日本话。于是学生一句一句学，有时一个词研究一星期，弄懂了，互相握手流泪。花了八年才译出一本解剖学。他们说：“以后看吧。一定要搞得不比先生的国家差。”实藤惠秀也说：日本留学生“是抱着决死的心情和志愿出国留学的”。高桥敷用日本人的故事说服了秘鲁学生，还自以为“丑陋”，说不如外国，例如秘鲁，把人当作人，有人情味。

我不懂留学，更不懂日本，但我们和东邻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总该多知道人家一点吧。

1989 年

读书断想

孔子说过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我读书几十年，知道的不多，忘掉的不少，到现在只能重复古希腊人的一句话：“我知道什么？”我写过文章，写过书，究竟所写的是我知道的还是我自以为知道的？我答不上来。自以为知道了，说出来，写出来，以后又知道自己并不曾知道，已经无法改变了。孔子的话很难做到。

我读书常感觉到一个问题：究竟原来是怎么说的？不是说转述的都靠不住，是说转述的人的话中有他自己的，不全是原来的。所以我总想追踪，寻根究底。讲孔子和传孔子的话的人很多，究竟孔子自己是怎么讲的？引几句话会不会断章取义？门徒记老师的话都那么准确无误吗？隔了多少年以后，隔在千里万里以外，讲古人、外国人的话多半要算讲的人自己的。我前面引孔子的话，就不敢说我讲的就是孔子的原意，只能说是我所理解的意思。千百年来亿万人读过的书，大家引来引去，若只听别人的转述和评论，不去直接查看，不能放心。例如不到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无人不读的《四书》，即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还有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，外国书例如《金刚经》、

《法华经》、《新旧约全书》即《圣经》，以及《古兰经》，这些都是影响过人类中无数人的思想言论行动的。今天的人好像不大读这些书了，但影响还在，片言只语还常被人转述。若不亲自看一下，不稍稍知道一点，对有意或者无意的转述及评论的话不容易明白和判断。

中外古书读起来不能全懂，也不一定能每部读完。不要紧，不是研究，只是想知道本来面貌，就不必钻研，不求都懂。粗读过去总比不见面好些。读不全也比完全不接触好些。见过面至少不会将男作女以老为少。转述的人甚至翻译的人也未必懂得全和作者一样。

古书难全懂，也有个好处，自己知道没有完全知道它的意思。新书就不同。看来好懂，自以为懂了，可是不见得真是全懂了，和作者懂的一样了。对古书容易做到“不知为不知”，对新书就容易自以为知。所以新书，现代的书，很难照古书那样读。活人的话有时比死人的话还难懂，很容易懂错。

不过读新书和读古书有一点一样：要查问根底，不轻信转述，当心“倒爷”贩假货。然而文化“倒爷”和经济“倒爷”不同。所谓文化交流中少不了“倒爷”，只要知道这是经过中间人的，不把译文当原文，就可以了。还有，科学和深奥思想的通俗化，虽有“倒爷”之嫌，对一般人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，只不过贩卖伪劣商品不在其内。

家藏书寻根

忽然想起小时候看到的家里藏的旧书，从那里仿佛可以看出清代后期五朝（1821—1911）文化变化的一角。我的曾祖父是道光、咸丰时人。祖父是咸丰、同治时人。父亲则历经同治、光绪、宣统三朝，在民国二年（1913）去世。他们都是从前的初级知识分子（秀才）。我同样属于初级，只念完小学。毕业前后翻阅过他们遗留下来的几十木箱旧书。十八岁离开了家乡，再也未见那些书。现在一本也没有了，只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象。

那么多书几乎都是线装的，“洋装”的很少。线装书又是木板印的居多，石印的较少。铅印的只有那一箱“洋装”书，在当时是最新潮流了，不知在内地偏僻小县怎么得到的。其中有梁启超编的《新民丛报》，一年又一年合订起来，是在日本印刷出版的。《饮冰室文集》上下两大厚册，前面有作者的西装半身像和《三十自述》，那是梁在三十岁以前的著作。还有些“作新社藏版”的新书，介绍外国来的新学。严复译的《天演论》好像是线装的铅印本。《群己权界论》和林纾译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等书就不是线装了。但康有为编的《不忍杂志》仿佛还是线装。由这些书

可见清朝末年的普通知识分子能赶上维新，但达到革命（排满）的不多。还有一层，讲维新，虽犯忌，还不至于马上杀头；讲“排满”革命，要造反“光复”，那就不得了；而且除了上海有《民报》、《革命军》等书刊以外，鼓吹推翻清廷的书也少。

藏书的结尾很清楚，起头呢？一套《停云馆法贴》折叠本，是明朝文征明刻的。此外古书就是一部大丛书《学津讨原》，已不完全了，是嘉庆时刻的，正在道光之前，清代前期五朝的末尾，想必是曾祖父收藏的。这丛书中我那时能看懂的只是唐代传奇如《甘泽谣》、《剧谈录》，讲红线、聂隐娘的故事，宋人笔记如《梦溪笔谈》、《老学庵笔记》等等也不全懂，其他书多半只能翻翻看。有一部《红楼梦》，不知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。有不少《闾墨》，即《儒林外史》中马二先生之流选的中举中进士的考卷。试贴诗和律赋较少，在科举中不着重。有《东莱博议》，可见学八股文之外要会写策论了。《纲鉴易知录》供给历史知识。供给典故的《事类统编》（《事类赋》扩大版）及《康熙字典》之类当然不缺。《古文辞类纂》及其续编表示桐城派仍是文章正宗。四书五经和经常给儿童念的书如《幼学琼林》反而不多。原因是这些如同小学课本，随背诵随舍弃。书念熟了，也残破了，需要时另买新的。我在家念的《四书》就是残存的有“高头讲章”的木刻本《四书备旨》。此外还有医书《验方新编》，卜筮书《卜筮正宗》、《奇门遁甲》、